

##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以结构性改革突破促消费扩内需

□ 迟福林

高质量发展  
看消费

编者按: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压舱石,是畅通产业循环、市场循环的重要基础。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大众日报理论周刊推出特别策划——“高质量发展看消费”,敬请关注。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从当前现实情况看,我国内需不足的主要矛盾在于消费不足,消费不足的主要掣肘在于服务型消费潜力未有效释放。加快释放服务型消费潜力,关键在于以人为中心推进结构转型与结构性改革。

从山东的情况看,作为人口大省、经济大省、消费大省,2024年山东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5.0%,超过全国1.5个百分点;山东城乡居民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分别增长8.3%和10.1%,均远超山东城乡居民收入增速与消费增速。总的看,山东有条件加快释放服务型消费潜力,有效扩大内需。

## 扩大内需的关键在拉动消费

解决总需求不足的问题,关键在于拉动消费,其核心在于以“投资于”提升社会公共服务水平,增强消费信心、预期和条件。

第一,拉动消费是扩大内需的重中之重。首先,消费增速放缓。2024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较上年增长3.5%,低于GDP增速,较2023年下降了2.3个百分点。从全国层面看,消费增速放缓,成为拉动内需的突出矛盾。2024年,北京、天津、上海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现负增长;广州与重庆的增长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次,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2023年,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为39.6%,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约20个百分点。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2024年仅为44.5%,显著低于2023年的82.5%,甚至低于2020-2023年均值47.7%。再次,消费增速放缓是制约宏观经济的主要因素。在一系列刺激政策的拉动下,我国投资需求有所上升。例如,2024年,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5.7%,对全部投资增长贡献率达到67.6%,带动大宗耐用消费品销售额超过1.3万亿元。与此同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维持在3.2%的水平,民间投资下降0.1%,尚未有效反弹。但是,目前消费增速放缓,需求仍然不足,仍是制约宏观经济的主要因素。

第二,拉动消费需要稳定消费预期,增强消费信心。首先,增强居民消费意愿。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持续下降,显著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2012-2021年,我国城乡居民的平均消

费倾向总体呈下降趋势,从2012年的73.01%降至2021年的68.61%,并且明显低于美国同期90%左右的消费倾向。其次,增强居民消费信心。数据显示,2024年12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仅为86.4%,仍未恢复到2022年4月的水平。为此,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恢复和改善消费者信心。再次,释放农村消费潜力。当前,城乡收入差距使得农村居民消费能力受限。2024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119元)与城镇居民(54188元)的差距,明显超过农民消费水平(19280元)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34557元)的差距。如果通过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提升其消费预期,可以有效释放农村居民消费潜力,释放农村消费潜力。提升消费预期的关键在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第三,拉动消费需要“投资于”。其一,“投资于”不足掣肘消费潜力释放。以公共医疗为例。2021年,我国医疗卫生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8.91%,远低于全球2017年平均水平(16.23%)。再例如,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长期滞后制约消费潜力的释放。2023年,我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相差17.86个百分点,意味着仍有2.5亿农村户籍人口长期在城市工作生活,但未能获得城市户籍及充分的公共服务。这不仅影响了这部分人群的生活质量,也限制了他们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其二,“投资于”关键在于加快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增强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到2030年,如果能够基本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将为释放消费潜力奠定十分重要的制度基础。

## 拉动消费关键在于释放服务型消费巨大潜力

近年来,我国服务型消费快速增长,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中国消费的新亮点。拉动消费,扩大内需,关键是以结构性改革释放服务型消费的巨大潜力。

第一,服务型消费成为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

其一,服务型消费较快增长。近年来,我国服务型消费支出增速快于商品消费,且占比逐步提升。例如,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服务型消费支出同比增长7.4%,增速超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2.1个百分点。其二,服务型消费成为拉动居民消费增长的主动力。2014年以来,服务型消费对居民消费增长的贡献率大多数时间超过50%;在剔除疫情影响的特殊年份(2020-2022年),贡献率基本维持在60%以上。其三,我国服务型消费占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从国际比较来看,当人均GDP达到1.2万美元以后,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比基本上在55%以上的水平。若2030年我国城乡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比由2023年的45%左右提升到50%以上,预计将拉动至少2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

第二,关键是释放服务型消费潜力。其一,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比提升不及预期。近两年,尽管服务型消费占比有所增长,但不及预期。据相关研究预测,2025年我国服务型消费占比将达到50%,但受疫情等影响和冲击,2024年,我



## 专家介绍

迟福林,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海南自由贸易港研究院院长。曾获全国“五一”工程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等多项荣誉,入选“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经济学卷)》。

## 核心观点

●从当前现实情况看,我国内需不足的主要矛盾在于消费不足,消费不足的主要掣肘在于服务型消费潜力未有效释放。加快释放服务型消费潜力,关键在于以人为中心推进结构转型与结构性改革。

●当前,服务型消费需求明显增长,但有效率、高质量的服务供给还明显不足,为此,要以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破解“有需求、缺供给”的矛盾。

●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当前,我国总体上进入工业化后期,但城市化水平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并由此形成消费结构升级的突出掣肘。

国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比为46.11%,不仅与预期目标相比滞后,也与我国发展阶段不相适应。其二,农村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比仍偏低。2024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比分别为48.41%和40.29%,农村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比低于城镇居民8个百分点。城乡服务型消费占比的巨大差距,反映出农村服务型消费市场发展滞后,农村居民服务型消费需求未得到充分满足。其三,以服务型消费推动消费结构升级。我国仍是一个转型大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正处在重要阶段。若到2035年,我国城乡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比提升至55%左右,将新增40万亿元左右的消费需求。

第三,释放服务型消费潜力重在解决结构性矛盾。

首先,破解需求与供给的结构性矛盾。应当说,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对于拉动消费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适应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趋势,破解需求与供给的结构性矛盾更为重要。当前,服务型消费需求明显增长,但有效率、高质量的服务供给还明显不足,为此,要以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破解“有需求、缺供给”的矛盾。其次,破解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矛盾。破解服务供求矛盾,核心在于服务投资需要明显加大。数据显示,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2020年服务业投资占比为70.7%,到2023年占比下降到65.8%。在传统投资增速下滑的同时,服务型消费的投资空间仍然较大。2023年,我国大健康产业规模约为14.48万亿元,预计到2030年将上升到29.1万亿元。教育、医疗、养老、社区建设等领域的投资需求逐步增大,而这些方面的投资增长与实际需求仍有较大差距。再次,破解增长与分配的结构性矛盾。从现实情况看,能否拉动消费,形成良好的消费预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突破。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特别是释放服务型消费潜力,要着力破解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的突出矛盾,以民富优先为导向,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已成为深化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任务。

## 推进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

当前,我国总体上进入工业化后期,但城市化进程仍明显滞后。加快推进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成为充分释放14亿人的巨大内需潜力的根本之策。

第一,我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当前,我国总体上进入工业化后期,但城市化水平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并由此形成消费结构升级的突出掣肘。从国际经验看,发达国家工业化率达到峰值时,城市化率一般达到70%左右的水平。我国工业化率在2011年达到峰值,但当时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为50.5%,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34%左右。目前,我国总体上进入工业化后期,但城市化仍处于发展中期。2023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6.16%,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8.3%,两者相差约18个百分点。

第二,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蕴藏着巨大的内需潜力。

## 人工智能会让大部分人失业吗

##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挑战与治理

□ 戚凯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进展,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中国乃至世界各国的经济格局、社会治理模式和生活方式。其在推动产业升级、固定效率、优化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等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但同时也伴生信息安全、就业冲击、伦理困境、资源消耗等多重挑战。一方面,我们要继续大力支持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提升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与强国的地位;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提升现代化治理水平,在技术底线、法律法规、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等多方面有的放矢、精准治理。

## 赋能千行百业

蛇年春节假期,人工智能模型“深度求索”(DeepSeek)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深度求索”背后几乎完全本土化的人才团队跳出美国行业惯性思维,采用了更加高效的模型架构思路,“一朝踏江湖,便有华山论剑之能”,其诸多性能正在对齐美国顶级人工智能企业的高端产品,极大增强了中国的大国自信与民族尊严。“深度求索”的出现,极大激发了国内对于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兴趣,从高校学子到普通民众,掀起了一股试用人工智能的热潮。这一幕恰好体现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具备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

第一,重构产业生态,提升生产效能。早在2017年7月,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就明确指出,“新一代人工智能相关学科发展、理论建模、技术创新、软硬件升级等整体推进,正在引发链式突破,推动经济社会各领域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加速跃升”。新一代人工智能并非只是单一的文本或视频生成技术,而是一整套具有底座意义的科技创新与赋能体系,它已从单一技术工具升级为系统性创新引擎,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转型。例如,在制造业行业,跨国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中国研究院的报告披露,中国某汽车制造工厂将人工智能技术贯穿于生产的全流程,实现生产灵活自动化;家电巨头青岛海尔的冰箱能耗标识贴工序已经完全使用人工智能视觉定位与打印信息自动导入技术,在实现零差错的同时,也将生产效率提升30%。在农业领域,以深圳大疆为代表的智能农业无人机已经

在全国各地被广泛采用,2024年11月,大疆发布了最新款的T100型机器,这是全球首款搭载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技术的产品,其对复杂地形地貌与周边环境识别与反应能力甚至超出了人类的生理能力。总而言之,新一代人工智能作为“科技头雁”,对其他产业的溢出带动作用非常明显。2024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2025年要抓好的九项重点任务,其中之一是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开展“人工智能+”行动,逐步形成“技术突破—产业升级—经济跃迁”的良性循环。

第二,赋能社会治理,增进民生福祉。由于新一代人工智能的背后是海量大数据,强劲算力,先进的算法(简称“三算”),因此人工智能技术在破解许多社会治理顽疾痼疾时,往往拥有“降维打击”或“另辟蹊径”的神奇能力。譬如,在治理城市交通拥堵问题上,济南市的“人工智能+感知+互联网”系统就是其中的代表,通过庞大的实时数据采集系统,海量交通信息进入国家超算济南中心,再由云计算向交通信号灯与车辆反馈最优方案,使整体交通拥堵指数下降了5.6%,平均通行速度提升6.3%。在城市管理领域,譬如杭州依靠浙江较为领先的人工智能科技能力,于2019年4月率先成立“杭州城市大脑”公司,迄今为止,该系统已经全面介入城市的智能综合管理,可以实时分析热门景区的人流趋势,也可以自动发现一百余种险情并在10秒种内自动报警。在天气预报、气候变化监测、环境保护等领域,新一代人工智能更是大显身手,据华为披露,其自主开发的盘古人工智能大模型能够自动学习和分析大量的天气数据,包括气温、湿度、风速等多个指标,从而建立起一个全面而准确的天气预测模型,将天气预报的准确性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

第三,重塑生活方式,提升便利体验。新一代人工智能凭借强大的计算能力和自我学习能力,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的日常生活。依托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等核心技术,人工智能不仅提升了信息获取的精准度和效率,也在消费、交通、医疗等多个领域推动智能化升级。譬如,在日常消费与服务行业,人工智能客服可以基于用户历史搜索记录和兴趣偏好,向客户推送

合适的产品或服务,大幅减少信息筛选的成本。在智能家居领域,人工智能正使家庭生活更加智能化、便捷化。以华为Hi-Link、小米米家等生态系统为代表,智能家居设备已经实现了跨品牌、跨终端协同,用户可以通过语音或手机App轻松控制家中的照明、采暖、安防、家电等设备。在智能交通、智能金融等领域,华为、腾讯、阿里等中国一流的数字企业都在发力人工智能,推动自己的既往各类产品与服务深度融合人工智能,为消费者提供更为便利更省心的服务。

## 挑战值得重视

然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科技发展往往是把“双刃剑”,因此在欣喜中国的人工智能科技与产业发展欣欣向荣的同时,我们也要保持警惕,清醒客观地认识到新一代人工智能科技进步可能会给社会就业、公共安全、资源消耗乃至国防安全带来更新的挑战。

第一,就业市场可能出现新旧转换波动期。当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政府与普通民众都高度关注新一代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换言之,人们普遍担心“人工智能会让人失业吗?”对于这个挑战,不应草木皆兵,而是应该更为全面客观地看待。一方面,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科技进步都会带来劳动力市场的深刻变革,就像马车夫被汽车驾驶员取代,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不例外。世界银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国内外各方的研究明确指出,随着人工智能与自动化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低技能、重复性的劳动岗位将遭遇更大的影响,如上文提到的消费行业的初级客服代表、简单的文印与翻译、车间质检员与搬运工等,就业市场会在一个时期里出现新旧转换的波动。但另一方面,每一次科技进步都会创造出更多的、前所未有的新岗位,世界经济论坛的研究就指出,伴随着人工智能科技在各行各业的进一步应用,就业市场需要更多的人员提供指导服务,以便民众可以更轻松使用人工智能产品。许多研究也指出,与其说新一代人工智能会彻底取代人类的工作岗位,不如说其会更好地提升工作效率,譬如显著提高办公室文件处理的自动化程度。另外,还需要注意

到,当前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发展技术方向对于建筑、清洁、安装、维修、美容美发等传统手工型、技能型行业的影响非常小,因此不会显著影响到这些从业群体。

第二,公共安全特别是信息数据安全面临更大威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个人数据泄露和隐私侵害问题日益突出。大规模数据采集虽然提高了人工智能的智能化水平,但数据滥用问题却始终始终是公共安全治理的痼疾。目前,新一代人工智能,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达到了可以全方位伪造声音、视频的水平。这些深度伪造的虚假信息严重侵害人民群众权益,据新华社报道,近期以来东南亚地区的跨国电信诈骗集团开始使用人工智能等技术,实施更加复杂的犯罪手段,给各国警方带来更大挑战。在更严峻的情况下,这些伪造合成的虚假信息可能会在网络空间流传,从而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制造社会动荡。

第三,水电资源消耗巨大加剧生态压力。新一代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背后,有着沉重的环境代价。相较于传统的数字基础设施,新型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对电能与水资源的消耗明显增加。数据显示,一次人工智能搜索所需要消耗的水电资源是传统搜索引擎的数倍。大量的电力消耗给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事业带来新的不利因素。与此同时,人工智能还可能带来“电脑与人抢水喝”的问题。《自然》科学杂志就指出,在日益严重的淡水短缺危机、持续干旱和公共供水基础设施迅速老化的当下,亟须深度调查和解决人工智能的耗水问题。

第四,人工智能军事化威胁国防安全。近年来,一些霸权国家意识到新一代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巨大潜能,突破战争伦理底线,一意孤行开发完全自主武器(即所谓的“智能杀人机器”),或者利用人工智能加强对中国国防事业的监听监测。上述做法显然是对中国国家安全与根本利益的严重威胁与侵害。

## 做好风险治理

总体来看,当前新一代人工智能的科技革命高潮还未到来,人工智能科技、产业、经济都处于喷薄的前夜。中国是全球较为领先的人工智能大

国,在技术开发、市场运用、人才培养等各方面都具有较好的先发优势,但也要注意,中国距离人工智能顶尖强国还有较大差距,因此我们要继续大力支持人工智能的发展,不惧挑战,在发展进程中逐步解决各类伴生风险。另一方面,考虑到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风险已经显现,我们亟须提升现代化治理水平,在技术底线、法律法规、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等多方面的放矢,构建发展与安全并重的治理体系。

第一,建立技术安全底线,防范系统性风险。新一代人工智能的繁荣进步可能没有上限,但对其风险防范要有底线。我们必须结合本国国情,在数据治理、深度伪造、人工智能武器化等议题上设置明确规定,严格禁止新兴科技“堕落作恶”的可能性。

第二,完善法律制度保障,平衡效率与公平。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的确会影响就业结构,新旧转换也会扩大收入差距,引发社会不稳定,这就需要政府更多介入,进一步健全法律法规与制度保障体系,从兜底救济、职业再教育、社会保险等各方面加大对某些专门群体的关注,引导社会各界设立更多的转型期岗位,以帮助他们更平稳地应对时代潮流。同时,政府教育事业在进一步培养脑力型劳动者的同时,也要加大对技能型人才的重视与培养,避免劳动力市场的供需错位。

第三,深化全球协作,倡导包容性治理。中国作为全球领先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大国,也是国际社会负责任、爱好和平的主要大国,我们必将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开放共享,倡导构建包容性的全球技术生态。譬如,在联合国框架内继续推进人工智能绿色低碳发展,减少人工智能发展的生态代价;通过“一带一路”数字合作,支持更多后发国家融入人工智能发展浪潮。

新一代人工智能既是“经济增长的加速器”,也是“治理能力的试金石”。面对技术革命的历史性机遇,我们需以系统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制度创新防范“颠覆性错误”,以开放合作消弭“零和博弈”。唯有坚持“科技向善”原则,构建政府主导、企业履责、社会协同、国际联动的治理格局,方能实现人工智能与人类社会的共生共赢。

(作者系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